

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何去何从？

徐士彦 张 鑫

摘 要：本文从对《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一期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专辑的回顾出发，系统梳理和考察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并总结出三个主要发展趋势：经济学方法论正在向经济学哲学转换，经济学方法论和本应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思想史与非正统经济学正在加速分离，经济学方法论的考察对象正在从方法论转向具体方法。针对上述三种趋势，本文进一步从高等教育环境改变的视角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并探讨了这些趋势可能会给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带来的问题，尤其阐述了在遭受主流经济学霸权的全面压制下，方法论者不再广泛采用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事实上很难让其实现反思经济学发展的学术目的。基于此，本文认为要打破这样的困境，就需要恢复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的纽带关系。最后，为寻求恢复的途径，本文尝试性地给出了一个可行的研究策略，即米洛夫斯基的“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方法，并详细阐述了其内容、特点，以及就本文问题而言的适用性。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 发展趋势 经济思想史 非正统经济学

《经济学方法论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以下简称《方法论》)，是除《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与《经济学哲学》(*Economics and Philosophy*)以外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的主要学术阵地。2021年，已担任十五年杂志主编的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和韦德·汉兹(D. Wade Hands)在临近卸任之际仿照二十年前杂志编委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罗杰·巴克豪斯(Roger E. Backhouse)、凯文·胡佛(Kevin Hoover)和乌斯卡里·迈凯(Uskali Mäki)等人的做法，通过组织一期专题——“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学

[作者简介] 徐士彦，云南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650500，电子信箱：sawyer_xu@foxmail.com；张鑫，云南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650500，电子信箱：zx163163zx@163.com。

哲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来回顾和总结该研究领域自2000年以来所发生的重要进展。由于讨论主题的限制，还使得这两期“方法论”专辑设定了一个较为独特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项目。其独特之处在于，如果说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本身是一种特别针对于经济学而开展的反思性的学术活动的话，那么这两期专辑中的大多数文章不仅具备了这个基础层次上的“反思”的意思，还具备了某种更高维度的（或者说更元层面上的）“反思”的意思。例如，除了常规性地从方法论的视角来讨论和评估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以外，有关学者还着重阐述了以下一系列问题：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将以何种方式、通过何种渠道对主流经济学的沿革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确实是方法论者自觉的学术任务吗？在“经济学方法论”（economic methodology）这一术语中，所谓的“方法论”一词究竟指的是一种哲学框架（methodology），还是仅仅指经济学家在构造他们的经济模型或在检验经验现象时所用的具体方法（method）？如何看待作为一个特定研究领域的经济学方法论与其他毗邻研究领域的关系？以及，无论对于哲学家还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当代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热情究竟因何而起，这样的热情又会把它引向何处？等等。简言之，这些方法论者通过将他们的从业领域视为一个特定研究对象进而开展的研究，不仅仅只是一种“反思”，更是一种“反思的反思”（post-reflection reflections）。^①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回顾上述意义上的“反思的反思”来进一步地探讨和评估它可能会产生的后果，以及尝试性地为在这些后果中暴露出来的部分值得重视的问题提供一个较为妥善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本文将着重围绕近期出现的在当代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群体意识中逐渐消亡的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倾向和经济思想史倾向，以及方法论者对于这一现象的评价而展开，并指出绝大多数方法论者认为这种消亡是良性的认识实在有些过于乐观了。正如我们想要在后文中力图说明的那样，一旦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脱离关系，并试图维持某种孤立的、“客观的”立场的话，那么至少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作为一种生产新经济学知识手段的可能性及其价值就被极大程度地削弱了，甚至也有可能处于被边缘化乃至被瓦解的尴尬境地。余文首先梳理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近况，总结了自2000年以来其学科性质所发生的主要变化；其次，进一步解释和阐述了经济学方

^① 参见 Hands (2019)。

法论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相分离的原因和结果；最后，为如何引导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回归到其策源地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策略性建议。

一、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过去和现在

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有一段漫长而又短暂的历史。之所以说它是漫长的，是因为凡以往的经济学家大都明白理论创造力的真正源泉不会是在某种标准的偏见下一再确认事物的单调秩序，乃是通过新思想来重新勾画出经济学理论的疆界（Mirowski, 1994: 53—54）。正是由于他们深谙此道，所以创立不同的形而上学叙述也曾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言下之意，严格来说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至少要和经济学的历史一样漫长。之所以又说它是短暂的，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以高度离散化为主要特征，并不可避免地与各时代中不同的经济学家们各自对经济学理论的诉求和期许交织在一起。总之，在此之前它还不是一个体系化、专业化的研究领域。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老制度经济学（制度—演化经济学）的形成就根植于托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富有独创性的对自重农主义以来经济学形而上学体系的方法论批判 [凡勃仑称之为经济学的“先入之见”（preconceptions）]，一直以来，凡勃仑与之相关的作品也常常被视为经济学方法论领域中的经典文献。不过，部分归结于凡勃仑的有关论述有其过于浓厚的个人风格，即使在老制度经济学的全盛时期也很少有经济学家同行愿意为凡勃仑式的方法论批判添砖加瓦，从而导致了凡勃仑的这些贡献（也包括凡勃仑之后对一种彻底的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申明）更像是为了论证某种新生经济学说体系合法性的证明程序，而不是一个可以通过群策群力、循序渐进来推动其发展的经济学研究项目。在过去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史中，这种“单打独斗”的现象曾广泛存在。迈凯（Maki, 2012: xiv—xv）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来支持对经济学开展哲学思考，在论证的细节方面也几乎不具有跨时代的积累性特征。

因此，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与其前身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就是该学科的专业化程度。部分归结于由滞胀问题而导致的经济学危机，危机又带来了反思的需要，这便使得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方法论于20世纪80

年代左右开始逐渐兴盛起来 (Guala, 2021)。一般来说,方法论者通常把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1980)、劳伦斯·博兰 (Lawrence Boland) 的《经济学方法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Method*, 1982)、布鲁斯·考德威尔 (Bruce Caldwell) 的《超越实证主义》(*Beyond Positivism*, 1982), 以及同时代其他一些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专著的涌现, 看作该领域正在形成的标志。当然, 由于学科的专业化程度显然还取决于相应学术组织和学术平台的规模化, 所以 1989 年胡国亨 (Henry K. H. Woo) 和丹尼尔·富斯菲尔德 (Daniel Fusfeld) 创立的“经济学方法论国际网络”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Economic Method, INEM) 及同年其非正式通讯集的发行, 也经常被视为经济学方法论真正走向成熟的一个里程碑事件。INEM 后来将该非正式通讯集于 1994 年正式出版, 也就是今天的《方法论》杂志。

然而, 尽管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算起来最多也只有短短四十余年历史, 其间方法论者观点交锋的激烈程度却一点也不亚于在过去更长时间的经济学史中曾经出现的几次著名的方法论之争。加之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 反思经济学的需要与日俱增, 同时可供方法论者使用的哲学工具也越来越多样化, 所以研究主题的快速拓展和研究重心的迅速偏移也是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时代特征之一。在世纪之交, 汉兹 (2009) 就曾试图通过他的《思无定法》^① (*Reflection without Rules*) 来描绘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这幅快速变革的图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就像哲学史是由各种各样的“转向”所组成的一样, 在所谓的“公认观点”的纲领 (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证伪主义的) 被“迪昂-奎因”命题 (The Duhem-Quine Thesis) 和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 的范式论瓦解以后, 一时间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转向”——自然主义的、实在论的、修辞学的、解释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用主义的等等 (汉兹, 2009)。虽然说这些转向粗看起来风格迥异, 有不成体系、碎片化之嫌, 但深究起来依旧能够发现其中充斥着一种累进式的沿革关系: 一开始是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 (Deirdre McCloskey) 的经济修辞学解放了先前在布劳格等人的时代中被限制的以波普尔纲领和拉卡托斯纲领为核心的科学哲学主题, 随后是托

^① 也译为《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

尼·劳森 (Tony Lawson) 的批判实在论通过带回本体论批判提供了另一种解放“公认观点”束缚的方法论研究进路 (Lewis, 2003); 这些同时也为后来鲍勃·科茨 (Bob Coats) 和菲利普·米洛夫斯基 (Philip Mirowski) 等人所追寻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广阔运用铺平了道路, 进而又为科学知识经济学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但是, 如果说在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开展的前二十年, 这幅看起来波澜壮阔的场面背后的主旨仍然可以用基于哲学潮流的方向来拓展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进路的话, 那么自 2000 年以来, 方法论者的这一传统研究主旨或者说研究思路本身也正在悄然发生转变。下面, 我们有选择性地基于此次“方法论”专辑中的文献资料 (当然我们也结合了近期其他一些重要文献), 对近二十年来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三个主要发展趋势做一概括性的说明。这些趋势的出现意味着经济学方法论的学科性质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个趋势是就经济学方法论的学科归属问题而言的, 可以将其概括为经济学方法论正在向经济学哲学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转换。从字面意思上来说, “经济学方法论”顾名思义, 指的就是经济学属下的一个学科种类, 例如现行的 JEL 分类体系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System) 就把经济学方法论归在“经济思想史、方法论和非正统方法”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Methodology and Heterodox Approaches) 的大类下 (B4)。然而近二十年来, 经济学方法论越来越倾向于作为科学哲学专业下的一个研究方向, 而不是作为经济学专业中的一个研究类别。迈凯 (Maki, 2021) 指出, 在由谁构成的问题上, 经济学方法论的从业人员已从受聘于经济系的经济学家转变成了受聘于哲学系的哲学家。杰克·弗罗门 (Jack Vromen) 也认为, 如今的方法论者并不像过去的方法论者一样, 旨在试图通过引入科学哲学的见解来促进经济学的发展, 反而是将经济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案例来促进科学哲学的发展; 这导致了在自我认同的层面上, 方法论者不再认识到自己归根结底是一名经济学家, 甚至也不再至少认为自己处于经济学和哲学的学科交叉边界上, 而是将自己完全置于哲学的专业环境中 (Vromen, 2021)。由此现象而产生的一个最直接的追问是, 也许“经济学方法论”作为该学科的专有名称已不再适用。方法论者起码不能再像过去那样, 在完全等价和可替换的意义上同时使用“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学哲学”这两个术语, 因为后者更倾向于表明一种哲学专业的职业归属。当然, 在这一趋势中,

两个术语的语义间究竟存在什么具体的差异，以及经济学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究竟是一种替代还是平行式的拓展，戴维斯（Davis, 2020）认为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第二个趋势是就经济学方法论与其毗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关系而言的。根据上文中提到的 JEL 分类体系，经济学方法论显然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密切相关。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形成的初期，方法论者一般都是已成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如布劳格、特伦斯·哈奇森（Terence Hutchison）等人，而且其中大部分还属于非正统经济学阵营，例如富斯菲尔德、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和马克·图尔（Marc Tool）等非正统经济学家不仅参与还帮助了 INEM 的建立。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是体系化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赖以形成的策源地。首先，对于经济思想史而言，对方法论的关注有助于弥补战后经济思想史不断枯竭的研究素材；其次，对于非正统经济学而言，方法论研究有助于巩固和强化非正统经济学家在与正统经济学家开展范式竞争时，批判与反批判的手段和力度；最后，无论对于经济思想史还是对于非正统经济学来说，反思主流学说总是根本性的，而通过介入同样旨在反思的方法论研究则有助于将反思的对象进一步指向主流经济学说的形而上学体系，针对其底层逻辑展开批判，而不是停留在评价其历史和理论上。不过，近二十年来，方法论者不仅倾向于使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脱离关系，也倾向于回避非正统经济学。其结果是，“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关系已经明显弱化”（Hands, 2019），同时“侧重于非正统经济学的方法论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下降，例如制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奥地利学派的、后凯恩斯主义的等等”（Truc, Claveau, and Santerre, 2021）。尽管无论从其形成背景还是从其学科意义上出发，这两种现象同时出现有些悖于常理、令人费解，但大多数方法论者反而认为，“这些变化将有助于促进该研究领域的稳定、健康和发展”（Hands, 2015）。

第三个趋势是就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考察方式和考察对象而言的。20世纪时，麦克洛斯基（McCloskey, 1994: 265—279）曾在拓展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进路时提炼了一个著名的区分 [当然不光是麦克洛斯基，罗伊·温特劳布（E. Roy Weintraub）也在不同的目的上提炼了一个近似的区分（Weintraub, 1989）]，即“大写的方法论”（Big-M）和“小写的方法论”

(small-m)。麦克洛斯基 (McCloskey, 1985: 25) 指出: 就像“大写的真理”(Truth) 仅仅只是“说服”(persuasion), 与科学探究的过程无关一样, “大写的的方法论”也只是“说服”, 故而是无意义的; 只有“小写的的方法论”符合实用目的, 因为只有“小写的的方法论”才有助于为经济学家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建议。所谓“大写的的方法论”和“小写的的方法论”之间的实质区别, 既可以被简单地理解成“方法论研究”在字面意思上与“方法研究”间的区别, 也可以进一步用方法论研究中的“规范性分析”和“描述性分析”来捕捉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 前者参与的是某种哲学体系是否适用于经济学的讨论, 更着眼于评价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性质及地位问题; 而后者更多地只是参与描述现行经济学家在实际的科研工作中的方法论实践。近二十年来(实际上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方法论者遵循着麦克洛斯基等人的呼吁, 实现了从“大写的的方法论”到“小写的的方法论”的转换。如今的方法论者不再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地位感兴趣, 甚至也不再将经济学本身看作一个相对连贯和完整的知识体系, 他们只在特别细致和非常具体的意义上对经济学家在日常工作中所用到的研究方法及其问题感兴趣, 如: 怎样才能使因果推断更加可靠, 在众多的因果关系概念中哪一种更适用于经济学, 理论模型在经济推理中起到什么关键的作用, 数据操纵 (p-hacking) 是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计量经济学最佳经验检验的策略是什么, 可以从随机实验中吸取什么, 等等 (Heilmann and Reiss, 2022: 7)。由这种转向所导致的又一个结果是, 由于方法论者希望更务实地参与到经济学的发展当中, 因此他们更加关注在 21 世纪才出现的有影响力的经济学研究项目 (Davis and Hands, 2011: 1), 特别是行为经济学、神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吸引了方法论研究者的主要注意力, 从而使他们忽略了经济学的其他发展 (Truc, Claveau, and Santerre, 2021)。路易斯·米雷莱斯-弗洛雷斯 (Luis Mireles-Flores) 还将在“小写的的方法论”意义上展开的“经济建模和经济解释的哲学分析”、“因果推断、经验证据多样性和基于经验证据制定政策的认识论条件分析”与行为经济学并称为当今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三个最热门的研究方向 (Mireles-Flores, 2018)。

当然, 有必要说明的是, 上述三个改变经济学方法论学科性质的主要发展趋势并非是相互独立的, 而是互相关联, 甚至可以说是互为因果的。事实上, 其中的任意一种趋势都为其他趋势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从“大写的的方法论”到“小写的的方法论”的转换实质上驱逐了经济思想史学家和非正统经济

学家传统的方法论研究思路 (Boland, 2001), 尽管这严格来说并非出于麦克洛斯基的本意; 而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的分离, 又进一步弱化了经济学方法论从业者在经济学系谋取职位的现实条件, 从而将方法论者逐渐逼迫到了哲学系, 从而导致了在学科归属的问题上经济学方法论逐渐向科学哲学倾斜 (Davis, 2020); 反过来, 正是由于现在方法论者大多由哲学家构成,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考察经济学的历史和了解非正统方法不是完全必要的, 这样一来, 由于对经济学思想体系的了解不够完整, 又只能加剧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考察对象向“小写的方法论”转换 (Vromen, 2021)。

下面, 我们进一步解释上述现象的来龙去脉。基于本文的目的, 我们更多地把解释的重心集中在上述的第二种趋势上, 即分析形成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之间关系现状的原因和后果。

二、从高等教育环境的改变看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的分离

在解释该反常现象的形成原因方面, 戴维斯 (Davis, 2006, 2007, 2008, 2019a, 2019b, 2020) 近十几年来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受《真实世界经济评论》(*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杂志邀请访谈时, 戴维斯曾断言, “尽管主流经济学家通常予以否认, 但他们确实对此负有责任……以至于原先还同情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布劳格在其职业生涯的后期也开始逐渐敌视它” (参见 Morgan, 2018)。在戴维斯看来, 即使是弗雷德里克·李 (Frederic Lee) 在他的鸿篇巨著《非正统经济学史》(*A History of Heterodox Economics*) 中为我们描述的那幅当今经济学界的图景仍旧存在一个巨大的盲点: 主流经济学家不仅仅只是把经济思想史的、非正统经济学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看作是“反经济学的”, 将这些研究领域的研究者看作经济学的敌人, 驱逐出经济学界简单了事而已; 而且, 他们事实上通过其霸权地位分化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学术共同体, 使得一个原本还相对比较完整的经济学大类被拆解得支离破碎——这不是排挤, 而是全面压制 (Lee, 2009)。

那么, 主流经济学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压制了这个经济学大类, 进而使得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越来越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无关的呢? 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是通过对经济学的教育环境, 将曾经作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组

成部分的经济学方法论驱逐出了经济学专业，从而既切断了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的联系，也切断了经济学方法论与非正统经济学的联系。^①

主流经济学对非正统经济学进行压制早已不是什么秘闻。但是，即使是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美国非正统经济学的学术传承也没有因为政治迫害和国家机器的介入而被迫中断。之所以如此，部分的原因在于经济思想史专业为非正统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职业庇护所，加之两者都对历史—制度的分析方法展现出了偏爱，这使得在大学中教授经济思想史不仅成为非正统经济学家的主要谋生手段之一，也让经济思想史课程成为传播非正统经济思想的主要媒介。然而，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开始急转直下。在 1965 年至 1984 年间，美国经济学博士培养体系中的经济思想史课程开办率从原先的 42% 下降到了 35%，大多数的学校要么将经济思想史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要么索性停止授课，并且这种情况还在持续不断地恶化 (Aslanbeigui and Naples, 1997: 127)。其背后的根源在于，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看似客观的但实则是被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的美国经济学顶级期刊排名和经济学系排名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由于一方面这样的排名完全是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思路构建的，另一方面能否斩获高排名与学术质量（从而与教学质量）的评价体系直接挂钩，从而导致了作为排名竞赛参与者的高等院校将经济思想史专业视为无益的（甚至有时也会认为经济思想史专业对于争取高排名起到了负作用），进而在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计划中取消了经济思想史课程 (Lee, 2006)。从公开的政治迫害到略带迂回地设置一些让学生、教师、院系和高校去追逐的目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操控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威廉·达格尔 (William Dugger) 对于“权力”的理解。达格尔指出，作为被制度赋予的使任何人的意愿与自己的意愿相一致的能力，权力的实施与任何强制性的手段是无关的：“当行使权力的人必须要强迫其他人的时候，权力就是脆弱而明显的”（故而就会激起反抗），“当不需要强迫的时候，权力就是牢固的、不为人所注意的”（故而就会让他人心甘情愿接受掌控）(Dugger, 1980)。在美国经济学教育中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绝不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个例。自 1986 年以

① 就今天经济学现状而言，经济思想史学家和非正统经济学家其实可以被视为同一个经济学家群体的两种不同身份。关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关系的事实及其形成缘由的解释，参见贾根良、兰无双 (2016)。

来，英国高等教育在开展的“科研评估活动”（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中建立的“戴蒙德期刊名单”（The Diamond List）对实现主流经济学对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的压制起到了同样的效果（张林、徐士彦，2019）。

在大学课程计划中大幅减少经济思想史课程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带来了两个结果，这两个结果就是我们已在上文中总结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另两个发展趋势。第一个结果是，有一大部分没有接受过经济思想史训练的方法论者参与到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形成、发展和壮大过程中。加之此时一些学校的哲学系依托科学哲学开办了经济学哲学专业，这一举措很快将原本致力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经济系的教师和学生吸引到了哲学系，并且通过一段时间学术环境的浸染，使他们在自我认知中对经济学家身份的认同逐渐消散。因此，当这两股高等教育环境的力量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极大地降低了从经济思想史（及非正统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来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比重，同时也扩大了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使用哲学方法的范围和频率，从而削弱了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思想史（非正统经济学）的关系，并强化了经济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的关系，最终将其本身推向了经济学哲学（Davis, 2020）。显然，有大量哲学从业者参与到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领域中，这本身是一件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继续扩大哲学概念的使用范围和频率本身也是无可指摘的，但在主流经济学的全面压制下居然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哲学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专业性替代，这就难免使得在现行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侧重于历史的分析严重不足，从而削弱了方法论研究者对于一个完整的、全面的经济学发展过程的了解。此外，与经济思想史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不仅仅是方法论研究，还是方法史的研究。既然研究的对象是方法史，那么学者就势必会着眼于评估该历史过程是否在某种标准的意义上是进步的（Boland, 2001）。言下之意，“大写的方法论”是从这种角度出发归根结底要去考虑的一个方面，但随着与经济思想史学科关系的减弱，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更多地偏向“小写的方法论”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即第二个结果。

上述因素汇集到一起从而产生的一个现实案例就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University of Helsinki）的经济学哲学研究中心〔芬兰科学院社会科学哲学卓越中心（The Academy of Finland Centre of Excellence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与知识整合的趋势和张力项目（Trends and Tensions in Intellectual

Integration)], 该中心一直由方法论者迈凯所领导。^① 诚然, 迈凯“通过其出版物、工作小组和所创建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博士课程……在使经济学方法论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方面所做的工作比任何人都多”(Hausman, 2021), 但由于该中心一直挂靠在赫尔辛基大学的社会和道德哲学系下, 其中大部分成员来源于芬兰哲学家拉伊莫·图奥梅拉(Raimo Tuomela)曾在赫尔辛基大学哲学系创建的哲学研究小组, 所以在该经济学哲学研究中心内完全没有人专门从事侧重于经济思想史类的方法论研究(Mäki, 2008)。此外, 阿基·莱赫蒂宁(Aki Lehtinen)还指出, 赫尔辛基式的方法论研究纲领原则上要求方法论者一方面保留规范性的方法论分析, 另一方面则要求他们直接观察现行经济学家的实际做法; 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方面可能在描述历史时不涉及规范性的方法论分析, 另一方面即使涉及这样的分析, 其分析的对象在通常的情况下也不是指向当前的经济学的, 因此所谓的“赫尔辛基方法”(The Helsinki Approach)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总体上是相悖的(Lehtinen, 2021)。考虑到赫尔辛基大学经济学哲学研究中心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领域中的突出地位, 我们认为它在推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前行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的分隔。

那么, 这种分离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反应, 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好事吗? 尽管如前所述, 大多数方法论者从这样的变化导致方法论研究更容易被主流经济学认可和接纳的角度给出了正面的评价, 但仍有一些方法论者表达了他们的忧虑。

例如, 在《方法论》2021年组织的专辑中, 安娜·亚历山德罗娃(Anna Alexandrova)等人就指出, 通过越来越偏向“小写的方法论”的研究, 经济学方法论已过于追求经济学中的细枝末节, 如模型、随机对照试验、经济指标测度的可能性和精确性等。当方法论者在不断讨论某种经济学的技术工具不可能实现的时候, 他们早已忘记了他们还有更重要的责任, 即分析和评估经济学已经和正在发生的那些重大变化。亚历山德罗娃等人认为, 这种责任要求迫使方法论者的研究角度回归到“宏大视野”(big-picture), 将经济学本身重新看作一个整体的、过程的, 而非琐碎的、静态的——简言之, 就是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Alexandrova, Northcott, and Wright, 2021)。亚历山德罗

^① 关于对该研究中心历史的介绍, 参见 Mäki (2019)。

娃等人的这个观点虽不多见但事实上也谈不上新颖，戴维斯（Davis，2007）很早以前就提出过相似的主张，可惜直到现在显然还没有引起方法论者的充分重视。戴维斯强调了采用历史方法去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经济思想史学家特别善于梳理和描述不同经济解释策略的交汇、分野和相互竞争，而且这样的研究策略是方法论研究的前提。因为方法论者如果不了解这些经济解释策略的发展背景和过程，那么就不可能完整地解释和评估不同经济策略中的方法论。尤其在一个经济学正在发生快速变化的时代中，方法论者更需要仔细地去绘制不同经济解释策略的思想谱系，分析其中的区别和联系，因为这些策略通常来讲本身就是在与其它策略相关联的基础之上而发展起来的——如果方法论者要完成这一系列工作，那么同样也依赖于经济思想史的方法论研究视角。与此同时，非正统经济学的倾向也在作为一种反思活动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即使是汉兹（2009：436）也不得不承认经济学方法论是一个得益于非正统经济学家作为的丰饶角，这不仅仅只是因为后者提供了持续的方法论批判，也是因为事实上当代科学论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方面都根植于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影响，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制度－演化经济学之于实用主义、修辞学和解释学，等等。与非正统经济学相分离，一方面消散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在其前二十年内那幅由各种“转向”所组成的波澜壮阔的图景，另一方面则直接瓦解了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因为刻意寻求与主流经济学的联系为方法论者带来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那就是主流经济学事实上不需要任何的方法论辩护——主流之所以是主流，就是因为它的从业者可以通过其学术网络的支撑来继续使用他们的方法，而不需要任何的方法论论证来捍卫它。既然如此，那么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论证就是毫无意义的。虽然说也有一些学者辩称由于主流经济学也在往多元化的方向上发展，所以在这种多元化的背景下更有着方法论探索的需要（Colander，2009：36—47；Colander，Holt，and Rosser，2004）；但戴维斯（Davis，2008）同时也提醒我们，这种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其中每一个发展的方向都与非正统经济学的理念有关，包括将个体视为嵌入在社会中的而不是原子式的、过程是演化的而非机械的、个体和社会是互相影响的而不是无关的，因此立足于非正统经济学的方法论研究即使是在主流经济学多元化的今天也是重中之重。此外，希拉·道（Sheila Dow）还指出，这种多元化只不过是一种外表，主流经济学

在理论起点、方法论和对方法论的替代方案的态度方面仍然是一元的 (Dow, 2008), 因为对于非正统经济学家和主流的正统经济学家来说, “多元化” 这个术语本身就有着不同的含义 (Dow, 2021)。

上述观点充分说明, 温特劳布 (Weintraub, 1989) 曾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诘难——“经济学方法论不重要, 经济思想史才重要”——有着部分的先见之明。当然, 我们也不妨对温特劳布的这个过于激进的断言稍作修改: 脱离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基础的经济学方法论是没有前景和意义的, 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只有回到它的策源地, 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保持紧密联系, 才能让该学科再一次步入到那个尽管不受主流经济学界重视, 但仍有着无数思想火花不断迸发的时代。既然如此, 那么经济学方法论又该如何走向它的“归途”呢?

三、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未来: 一个策略性建议

需要说明的是, 经济学方法论在上述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研究进路是个例外, 它并没有刻意寻求与主流经济学的联系, 也没有随波逐流, 那就是劳森的批判实在论 (参见 Claveau et al., 2022: 161—165)。对于劳森而言, 之所以要将罗伊·巴斯卡尔 (Roy Bhaskar) 的先验实在论扩展到经济学范畴,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针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批判提供工具, 这使得批判实在论势必是非正统的。并且, 为了回答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设定为什么和劳森的社会本体论观点不一致, 以及经济学中的其他非主流的理论纲领在何种程度上维护了社会本体论观点, 它还势必是经济思想史的。这一点从劳森的两本代表性著作《经济学与实在》(*Economics and Reality*, 1997) 和《重新定向经济学》(*Reorienting Economics*, 2003) 的行文风格和内容安排上就可见一斑。因此, 上述问题的答案看起来似乎是异常简单的: 只要方法论者更加重视批判实在论的研究纲领, 那么经济学方法论就自然能实现向其策源地的回归。

然而问题是, 批判实在论的研究集中迸发于 20 世纪 90 年代, 它没有在 21 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沿革过程中发挥主要的引导作用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戴维斯曾指出, 批判实在论作为一种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策略实际是失效的 (参见 Morgan, 2018)。戴维斯认为, 尽管批判实在论在与其他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策略的竞争过程中不断深化了它的论点, 但其本身过于明显的异端色彩,

也导致了它比从前变得更加孤立无援，从而失去了它的影响力。换言之，在戴维斯看来，批判实在论没有在经济学方法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拓宽其生存空间，这使得它除了吸引那些原本就对非正统经济学方法和经济思想史感兴趣的方法论者以外，很难再对其他方法论者产生影响。此外，即使方法论者注意到了本体论前提的重要性，他们也不一定完全支持包含在批判实在论中的非正统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分。这个例子同样也来自迈凯，他把自己的实在论研究进路称为“自下而上”（bottom-up）的方法，用以和劳森的“自上而下”（top-down）的方法相区别（Maki, 1998）。较之于劳森，迈凯更多地注重考察在主流经济学范围中本体论前提的一致性，对改变主流经济学基本没有兴趣（参见汉兹，2009：356—360）。尽管在迈凯的研究中的确存在一些批判，但这些批判多具有澄清性质，而不是像劳森的非正统式的观点那样，是亵渎性质的。总之，批判实在论作为一种研究纲领无疑是成功的，但是作为一种研究策略，它还存在着有待商榷之处。

因此，本文尝试性地从批判实在论之外寻找另一种可行的方案，这个方案指的是米洛夫斯基的“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The Vortex Model of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供的研究策略也许只是诸多可行研究策略当中的一个，而且该具备科学知识社会学特色的研究策略并非是针对一般性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前景而言的。我们仅认为，如果米洛夫斯基的“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那么将有助于减轻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的分离现状，从而有助于推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回归到“宏大视野”，进而有助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实现其根本的反思目的。下面，我们先简要地介绍该模型的产生背景、内容、特点和已有应用，然后说明为什么该方法有助于吸引更多的经济学方法论从业者，使得经济学方法论向其策源地回归。

相信即使没有听说过，绝大多数人也会对以下这句话感同身受——“经济学源自于并得益于自牛顿以来物理学的发展”。然而，这样一个断言要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当成一个不需要加以详细证明的、显而易见的常识，要么则被看作一种修辞手法，表达了一些方法论的批判者对于经济学过度形式化、过度机械化和缺乏思辨过程的不满和担忧；很少有人能像米洛夫斯基那样，把半生精力花费在验证这样一个问题上。米洛夫斯基（Mirowski, 1989a）的《意气用事：作为社会物理学的经济学和作为自然经济学的物理学》（*More Heat*

Than Light: Economics as Social Physics, Physics as Nature's Economics)① 显然是探讨这个问题最为权威和经典的著作(霍奇逊, 2008: 6), 这使得这位据说一开始只想要成为一名电影导演的学生在沉寂了许多年以后凭借着此书跻身在了当世经济思想史学家和方法论学者的顶尖行列当中。对于一些经济学同行们来说, 这本著作像极了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怪物, 无缘无故地矗立在荒野当中。他们屡次三番想要接近它、驯服它, 在几度无果之后只能依靠人身攻击和言语上的咒骂来让自己的无能为力显得心安理得——而这仅仅是因为这本著作讨论了作为隐喻的热力学的能量概念在自然科学(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学)中的来回借用, 并揭露了正统经济学“物理学嫉妒”(physics envy)的心理, 从而揭示了正统经济学只不过是物理学的狗尾续貂。不过, 对于另一些经济学同行们来说, 这本著作功勋卓著的地方还不光在于它富有挑战性的结论, 他们认为它提供了一种既富有创造力又便于使用的研究方法, 这才是米洛夫斯基的《意气用事》之所以能被看作一本划时代著作的真正原因(De Marchi, 1993; Weintraub, 1993; Rizvi, 2001: 209—221)。而这个研究方法, 就是“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

米洛夫斯基曾多次指出, 他的研究方法并非来自经济学而是来自人类学, 主要是对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三位人类学家所提出命题进行的一种适应性修正, 因此米洛夫斯基也把该方法称为“DMD”(Durkheim-Mauss-Douglas)命题: 文化对自然事物的分类再现了文化对人类的分类; 人类社会的分类通常来讲, 是人类对自然界进行文化分类的一个镜像。基于这种认识, 米洛夫斯基(2011: 66—67)指出:

各个社会对它们的社会观念和自然观念的灵感源泉与确认有着极大

① 书名“More Heat Than Light”的直译是“热多于光”,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不采用直译而把它翻译成“意气用事”, 主要的原因是“more heat than light”是一句英语俚语, 最早出自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哈姆雷特》。在语言使用习惯的长期演化过后, 较之于莎士比亚的原意, “heat”多了一层“情绪”的意思, 而“light”则多了一层“理智”的意思, 因此“more heat than light”可以被理解为“情绪多于理智”。由于直译无法更完整地涵盖该俚语的含义以及更直接地体现米洛夫斯基此书的主旨, 我们认为“意气用事”似乎是一个更加妥善的译法。

的差异，但是通过把社会观念和自然观念互相联系起来的这种方式，以及通过一系列观念的信念来强化另一系列观念的信念的这种形式，不同社会之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关于自然界的各种理论，是由于源于文化中的社会关系所塑造的，这些理论又反过来以具体化了的形式表达出这一文化的秩序理想的本质。这种秩序理想从而又塑造了对社会观念和分类的表达，最终在社会领域中转变了有关掌握和控制的最初观念。通过把各种拟人的观念持续地投射到“造物主”身上，并通过它在掌控拟人化的自然时声称的成功，有意地证实了社会领域中的结构的效力和合法性，这个环路或者涡流得以形成。

因此，在所谓的“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中，“科学社会学”一词指的是将自然科学的概念或观念和社会科学的概念或观念相联系起来的一种考察方式，而“涡流”一词则指明了它们以何种方式相互联系起来，即一个领域通过隐喻的投射在另一个领域中获得合法性证明，反之亦然。在米洛夫斯基看来，这个模型的优势在于一方面为讨论相同的词语在不同的语义学情景中的交互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则为这种隐喻的流动指明了方向性，从而能够帮助研究者通过一种广阔的视野来解释和把握不同学科的历史变化，以及在学科的历史变化中提炼出它的不变性，从而便于创造一个“对于科学史，以及对于认识论中的各种争论……的丰饶角”（米洛夫斯基，2011：67）。

在实际应用方面，可以说米洛夫斯基的几乎所有研究都是他运用该涡流模型的直接结果，这些例子主要包括：（1）作为嵌入在分析哲学“涡流”里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作为嵌入在解释学“涡流”里的制度-演化经济学的本质区别（米洛夫斯基，2011）；（2）处于同一个“涡流”里的政治经济学和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Mirowski, 1988）；（3）古典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如何造就了物理学的“能量”概念，以及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发展（Mirowski, 1989a）；（4）“概率”概念从其原本的社会、经济和法律领域向天文、物理和数学领域的游离过程，以及它最后又是如何被当成自然定理反过来被移植到经济学，从而形成现在被称为计量经济学的过程（Mirowski, 1989b）；（5）作为建立在分工原则基础之上的设计一种机械计算装置（也就是计算机的雏形）的理念如何通过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反过来为经济学带来了博弈论这种分析

工具 (Mirowski, 2002); 等等。当然,“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的运用也不仅限于米洛夫斯基个人。一个例子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该模型同样也激发了杰弗里·霍奇森 (Geoffrey Hodgson)^① 的灵感,进而促使了霍奇森从生物学和经济学共同造就的“涡流”的角度出发 (“本能”隐喻的流动),重新描绘了一幅有别于制度-演化经济学家传统认知的制度-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图景 (参见霍奇逊, 2012)。

那么,为什么“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会有助于改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的分离现状呢? 主要有三个理由。

首先,“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分析方法,虽说它不是完全建立在经济思想史的考察模式上的,但它仍然要求将对经济学史的考察和对科学史的考察结合到一起。尽管今天经济思想史学界的一个公认看法是,米洛夫斯基的方法加剧了经济思想史学科被驱逐出经济学界,因为“它迫使经济思想史学家首先成为历史学家,其次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史只不过是更庞大的、更完整的思想史图景中的一部分” (Weintraub, 1993),但从本文所涉及问题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它反而有助于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传播和在其他学科领域中的渗透。这是因为,在经济学方法论全面转向经济学哲学的今天,强制要求科学哲学家回过头来掌握完整的经济学史的内容并不可行,在科学哲学专业下开设经济思想史课程似乎也是困难重重的,但科学哲学家们通常来讲对于科学史非常熟悉,所以通过“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的应用和推广,有助于再一次将面向经济学史的考察内容带回到方法论者的视野中。

其次,在“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中,非正统经济学的方法论立场不是预先被设定的,而是在探究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上文已经说明,米洛夫斯基方法的核心就是通过隐喻的流动来谱写一种涡流式的理论发展历程,而一旦完成这样的工作,学者紧接着就会萌生出探索不适用于该涡流模型的其他理论以及在近似的主题上还存在什么涡流结构的欲望。由于正统和主流的经济学发展一直以来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连,这种后续的探索欲望能够将方法论者的研究重心从主流经济学身上转移开,带入到非正统经济学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话语领域中去。事实上,米洛夫斯基的《意气用事》本身已为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建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一个精简地解读《意气用

① 亦有译为杰弗里·霍奇逊。

事》的方式是把这本著作看作对库恩命题和凡勃仑命题的一种扩展和综合，但在故事的最后，米洛夫斯基隐约地告诉我们有一种经济思想流派的价值理论成功地抵御了自然科学的“海妖之歌”，那便是作为非正统经济学三大支柱之一的制度－演化经济学的社会价值理论，米洛夫斯基后续也为通过发展和完善制度－演化经济学的社会价值理论来打破存在于经济学和物理学间的那种隐喻连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参见 Mirowski, 1990, 1991）。

最后，上述这种后续的探索欲望有助于让方法论者不止步于解释和评价经济学理论，也为方法论者参与到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活动提供了可能。在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研究领域形成的初期，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曾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有过一个谴责，他认为自称为方法论者的那些经济学家通常无法在他们自己的方法论建议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更好的经济学理论，简言之就是方法论者“说得太多，做得太少”了（Samuelson, 1983）。我们有理由相信萨缪尔森谴责的可靠性，因为即使是在刻意寻求主流经济学认同的今天，的确也很难见到方法论者对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推动作用。然而，米洛夫斯基却通过其对于“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的运用提供了一个少见的案例：其社会价值理论不仅剔除了在传统的经济学价值理论中被误用的“能量”隐喻的成分，也修正了在制度－演化经济学的学术传统中被过于强调的“价值学”（Axiology）倾向，从而让后者找到了回归到“市场学”（Agoralogy）的关键路径，让制度－演化经济学的社会价值理论从纯粹的道德判断转向“将数学的严谨性和对历史偶然的敏感性结合起来，将作为护身符的数字与对符号结构的关心结合起来，将使用权利和义务的语言与对社会秩序的构建性认知结合起来，将个人自由与社会决定结合起来”（Mirowski, 1990），同时也为寻求更广泛的非正统经济学共识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础（参见 Garnett, 1999）。总而言之，这种能让方法论者真正参与到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方法论研究进路，无疑对于持有任何倾向的方法论者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该方法的不断推广和运用能够深化和巩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携带的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的部分，从而有助于经济学方法论实现向其策源地的回归。

参考文献：

- 汉兹, D. 韦德, 2009, 《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 段文辉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霍奇逊, 杰弗里·M., 2008, 《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

- 高伟、马霄鹏、于宛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霍奇逊，杰弗里·M.，2012，《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美国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结构和达尔文主义》，杨虎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贾根良、兰无双，2016，《如何评价经济思想史家大都是异端经济学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米洛夫斯基，菲利普，2011，《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载马克·R. 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
- 张林、徐士彦，2019，《学科评估：经济思想史发展的主要事件——英国经验及启示》，《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4期。
- Alexandrova, Anna, Robert Northcott, and Jack Wright. 2021. “Back to the Big Pic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8 (1): 54–59.
- Aslanbeigui, Nahid, and Michele I. Naples. 1997. “The Changing Status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n Economics Curricula.” In *Borderlands of Economics: Essays in Honor of Daniel R. Fusfeld*, edited by Nahid Aslanbeigui, and Young Back Choi, pp. 125–144. London: Routledge.
- Boland, Lawrence A. 2001. “Towards a Useful Methodology Discipline.”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8 (1): 3–10.
- Claveau, François, et al. 2022.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Three Decades of Bibliometric History.”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edited by Conrad Heilmann, and Julian Reiss, pp. 151–168. New York: Routledge.
- Colander, David. 2009. “Moving Beyond the Rhetoric of Pluralism: Suggestions for an ‘Inside-the-Mainstream’ Heterodoxy.” In *Economic Pluralism*, edited by Robert Garnett, Erik K. Olsen, and Martha Starr, pp. 36–47.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Colander, David, Richard Holt, and Barkley Rosser. 2004. “The Changing Face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6 (4): 485–499.
- Davis, John B. 2006. “The Turn in Economics: Neoclassical Dominance to Mainstream Pluralism?”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 (1): 1–20.
- Davis, John B. 2007. “The Turn in Economics and the Turn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14 (3): 275–290.
- Davis, John B. 2008. “The Turn in Recent Economics and Return of Orthodox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2 (3): 349–366.
- Davis, John B. 2019a. “Economics and Economic Methodology in a Core-Periphery Economic World.”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9 (3): 408–426.
- Davis, John B. 2019b. “Specialization, Fragmentation, and Pluralism in Economic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6 (2): 271–293.

- Davis, John B. 2020.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Economic." *Revue de Philosophie Économique* 21 (2): 187–210.
- Davis, John B., and D. Wade Hands. 2011. "Introduction: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In *The Elgar Companion to Recent Economic Methodology*, edited by John B. Davis, and D. Wade Hands, pp. 1–18. Cheltenham /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 De Marchi, Neil. 1993. "History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Value Theor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5: 283–299.
- Dow, Sheila C. 2008. "Plurality in Orthodox and Heterodox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Economics* 1 (2): 73–96.
- Dow, Sheila. 2021. "Economic Methodology,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y: Another Turn?"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8 (1): 46–53.
- Dugger, William M. 1980. "Power: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4 (4): 897–907.
- Garnett, Robert F. 1999. "Postmodernism and Theories of Value: New Grounds for Institutional/Marxist Dialogu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3 (4): 817–834.
- Guala, Francesco. 2021. "On Letting Serious Crises go to Waste."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8 (1): 40–45.
- Hands, D. Wade. 2015. "Orthodox and Heterodox Economics in Recent Economic Methodology." *Erasmus Journal for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8 (1): 61–81.
- Hands, D. Wade. 2019. "Economic Method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o Far): Some Post-Reflection Reflections." *Revue de Philosophie Économique* 20 (2): 221–252.
- Hausman, Daniel M. 2021.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Past and Fu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8 (1): 14–22.
- Heilmann, Conrad, and Julian Reiss. 2022. "Introduction."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edited by Conrad Heilmann, and Julian Reiss, pp. 1–19. New York: Routledge.
- Lee, Frederic S. 2006. "The Ranking Game, Class, and Scholarship in American Mainstream Economic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Education* 3 (1&2): 1–41.
- Lee, Frederic. 2009. *A History of Heterodox Economics: Challenging the Mainstrea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Lehtinen, Aki. 2021. "The Helsinki Approach to Economic Methodology, or, How to Espouse the Mainstream?"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8 (1): 79–87.
- Lewis, Paul A. 2003.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The Rhetorical and Ontological Turns." *Foundations of Science* 8 (1): 51–68.
- Mäki, Uskali. 1998. "Aspects of Realism about Economics." *Theoria* 13 (2): 301–319.

- Mäki, Uskali. 2008. "Realism from the 'lands of Kaleva': An Interview with Uskali Mäki." *Erasmus Journal for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1 (1): 124 – 146.
- Mäki, Uskali. 2012. "Preface." In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13,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edited by Uskali Mäki, pp. xiii – xvii. Oxford: Elsevier.
- Mäki, Uskali. 2019. "TINT in Context-Centre for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in Helsinki." Accessed July 5, 2022. <https://philsci.eu/Newsletter/2019/Spotlight/>.
- Mäki, Uskali. 2021. "The Field: Tasks, Pasts, Futures."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8 (1): 3 – 13.
- McCloskey, Deirdre N. 1985.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McCloskey, Deirdre N. 1994. *Knowledge and Persuasion in Econom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reles-Flores, Luis. 2018. "Recent Trends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A Li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36 (A): 93 – 126.
- Mirowski, Philip. 1988. *Against Mechanism: Protecting Economics from Scienc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Mirowski, Philip. 1989a. *More Heat than Light: Economics as Social Physics, Physics as Nature's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rowski, Philip. 1989b. "The Probabilistic Counter-Revolution, or How Stochastic Concepts Came to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41 (1): 217 – 235.
- Mirowski, Philip. 1990. "Learning the Meaning of a Dollar: Conservation Principles and the Social Theory of Value in Economic Theory." *Social Research* 57 (3): 689 – 717.
- Mirowski, Philip. 1991.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Theory of Value."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3 (4): 565 – 582.
- Mirowski, Philip. 1994. "What are the Questions?" In *New Directions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edited by Roger E. Backhouse, pp. 50 – 75. London: Routledge.
- Mirowski, Philip. 2002. *Machine Dreams: Economics Becomes a Cyborg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rgan, Jamie. 2018. "Heterodox Economics and Economic Methodology: An Interview with John Davis."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86: 134 – 148.
- Rizvi, S. Abu Turab. 2001. "Philip Mirowski as a Historian of Economic Thought." In *Historians of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hought: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Memory*, edited by Steven G. Medema, and Warren J. Samuels, pp. 209 – 222. London: Routledge.
- Samuelson, Paul A. 1983. "My Life Philosophy." *The American Economist* 27 (2): 5 – 12.
- Truc, Alexandre, François Claveau, and Olivier Santerre. 2021. "Economic Methodology: A

- Bibliometr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8 (1): 67 – 78.
- Vromen, Jack. 2021. “What are We up to?”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8 (1): 23 – 31.
- Weintraub, E. Roy. 1989. “Methodology doesn’t Matter, but the History of Thought Might.”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91 (2): 477 – 493.
- Weintraub, E. Roy. 1993. “After Mirowski, What?”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5: 300 – 302.

***Quo Vadis*, Economic Methodology?**

Xu Shiyan^a and Zhang Xin^b

(School of Economics, Yunnan University^{ab})

Abstract: Starting from reviewing a special symposium issue on economic methodology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summarizes three main trends: economic methodology is being transformed into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the separation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from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heterodox economics is accelerating, and the topic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is shifting from Methodology to specific methods.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se three tre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that these trends may bring to the study of economics methodology. Based on tha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o break out of this dilemma, it is necessary to restore the ties between 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heterodox economics. Finally, in order to find a way to recover the ties, the paper tentatively gives a feasible research strategy, namely Philip Mirowski’s “vortex model of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pproach, whos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this paper are elaborated.

Keywords: Economic Methodology, Development Trends,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Heterodox Economics

JEL Classification: B00, B40, B41

(责任编辑: 王姣娜)